

“结构—关系”：大学生生活社区内的权力逻辑

韦 谢

摘要：本文选取大学生生活社区作为切入点，通过观察学生和管理员之间的互动过程，试图得到对大学生社区的基本认识。其重点是解释该社区内冲突的来源，以及冲突背景下管理员的控制路径。本文使用一手经验材料，试图通过结合中国本土理论，跨越宏观与微观的划分，以结构—关系的模式来分析大学生生活社区的权力逻辑。本文要论证的是，无论是结构还是关系，都无法全面的阐释大学生社区中的权力互动的机制，只有将它们结合起来，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社会事实。

关键词：权力 控制路径 人情面子

绪 论

回顾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充斥许多长期分裂的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这些二元对立包括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知识模式间的对立、符号性分析与物质性分析的分离，以及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脱节（布迪厄，华康德，2004:3）。在社会学研究中，权力的研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吉登斯，2003: 641），社会学理论的三位经典大师几乎都对权力的话题作了自己的解释，沿着他们的思路而建立的三个重要的社会学理论流派——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和功能主义——各自对权力理论进行了修正、补充，甚至重新诠释。然而“权力”作为社会学理论中重要概念，自然难以逃脱这些二元对立的困境。

一、权力理论述评

在卡尔·马克思（Karl·Marx）的观点中，权力的概念往往和政治、阶级结合在一起（柯林斯，马科夫斯基，2006:51-58）。这是一种宏观的视角，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为标准，把社会分为两大阶级，无产阶级时刻遭受资产阶级的支配和剥削。马克思显然把复杂的人类生活世界简单的二元化了，忽视了他所谓的“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内部，形形色色的权力关系。马克思认为，权力永远根植于经济关系中，谁拥有生产资料谁就直接或间接地行使政治权力。韦伯对此表示赞同，尤其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权力是主要形式。但他提出：“经济权力可能来自非经济的权力。”谋求权力的做法常常是由权力所带来的“荣誉”决定的。

马克斯·韦伯（Max·Weber）对“权力”作了最早的权威定义¹：“权力意味着在某种社会关系中贯彻自己的意志并排除反抗的所有机会，不管它是基于什么原因”（韦伯，2004:3）。作为理解社会学方法论的一个环节，韦伯的权力理论强调了人的主观性在社会行动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权力来源于统治，而作为统治基础的权威必须得到社会关系的主体——人的理解和认同。韦伯强调行动者的主体性的同时，并没有把社会结构对行动者的作用把握住，尽管这种作用是普遍性的。

埃米尔·涂尔干（Emile·Durkheim）似乎没有直接论述权力，但是他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划分为后来的功能主义权利理论奠定了基础。涂尔干（2000）认为，“在仅有集体人格存在的时候，所有权本身必定是集体的所有权。只有在个人摆脱了大众，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格的时候，只有个人既作为一个有机体，又作为一个社会生活要素的时候，所有权才会成为个人的所有权。”虽然这部分人只是代表整个社会整体维护着社会的机械团结，由于社会个体是从属于社会整体的，这部分人也就拥有了统治权力，权力的获得是建立在集体人格的基础之上。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中，社会分工的产生会导致社会分化，产生不同的职业群体，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代言了集体共有价值

¹这一定义至今仍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广泛应用,本文也采用此定义。

时，社会不平等和分层由此产生；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中，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社会成员的异质性增加，集体人格逐渐消失使社会平等、稳定。涂尔干把社会分化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分工，即职业分化，视野相对比较狭窄，没有考虑到文化、习性、偏好等对人群的区隔。

在西方社会学历史上，这三位思想大师对近代的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和功能主义理论流派影响巨大。

帕森斯对前人的理论进行了大综合，开创了“结构功能主义”流派。他沿袭韦伯的“行动者”的概念，以“行动的逻辑”为逻辑起点，试图建立一个框架解释人类的行动逻辑。在他 1951 年出版的著作《社会系统》中，帕森斯把社会行动纳入社会系统中，为了沟通主客观现象，创造了模式变量理论（贾春增，2000：226）。这是打通主客观界线的一次努力，但是概念的限制把最为研究对象的社会行动切割开来，行动被置入孤立的系统中进行研究，社会行动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含糊不清。在权力的问题上，帕森斯的观点与韦伯类似，即权力的获得建立在某种共有的制度化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同上：225）。尽管 1960 年代对帕森斯的理论批评不断，但是难以有超越。最早对之提出批评的是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符号互动论，冲突理论被默顿（Merton）纳入到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中；符号互动论被作为与帕森斯的宏观理论相对应的微观理论与之共存；推崇交换主义的霍曼斯因其行为主义倾向，他的理论并不为大多数社会学家认同，而布劳不过是“重建”了一个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一样的结构社会学（李猛，1996a）。这些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功能主义存在的问题。米尔斯（Mills）跨出了帕森斯的框架，从另一个视角对权力进行诠释，提出了“权力精英理论”。在他的著作中，理论和经验研究做了很好的融合，举了大量的例证，说明了精英们之所以享有非凡的权力既和他们自身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关，也因为他们彼此间的联系和协调。通过经济、政治、军事领域的精英的沟通和协调，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被放大了（米尔斯，2004）。伦斯基（Lenski）通过对功能学派和冲突学派观点的综合，提出“权力分层理论”（伦斯基，1988:25），在他的理论的六条基本假设中，人类的普遍性被强调，权力和特权被认为是作为维持社会结构的手段而存在。毫无疑问，伦斯基的理论为突破功能论和冲突论的对立作了巨大贡献，但是显然，人类的个性被忽略了。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遇到一些理论和经验的矛盾，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其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将拥有（possess）生产资料而非占有（own）作为获得对剥削阶级的划分，因此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而非占有才是阶级权力获得的源头。“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核心人物普兰查斯（Poulantzas）试图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以第二国际为代表）和历史主义（以卢卡奇、萨特为代表）的两个极端（刘力永，2007）。他把阶级权力独立出来进行论述，认为阶级是独立于人类的个体需要和欲望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都仅仅是阶级权力的实施场，而阶级权力的获得被认为是该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取得了多大成功。因此他并不关注个体间的权力关系，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的局限所在。到 20 世纪中期，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把视线集中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的日益兴起的社会主义阵营。吉拉斯（Djilas）指出，苏维埃式官僚无疑成功的在官僚主义计划体系中创造了一种使新阶级的出现成为可能的新的结构位置。个人私有财产被没收、旧资产阶级的阶级权利被实际控制生产数据的政治官僚所取代（孔寒冰，项佐涛，2006）。这似乎可以算是这个时期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以达成的共识，即他们开始关注结构位置的问题，因为在作为他们研究对象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资格和他们可获得的权力存在着极大的相关。而 1970 年代以后的新马的理论家们开始意识到知识分子正在崛起，古尔德纳（Gouldner）创造了一个概念：文化资产阶级。他认为，利用知识作工具，知识分子可以自己替代无产阶级并在革命中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陶文昭，1997）。以塞勒尼（Szelenyi）则认为新阶级（知识分子）的出现无论在东方或是西方都是无法避免的，相对而言，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国家比在资本主义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可能性更大，而由知识分子通知的两种社会在后工业社会将走向趋同。总的来说，新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同样对社会成员进行了阶级的划分。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在前者的理论中，阶级多元化，阶级理论的内涵更加丰富。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衰，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提供了极好的实证素材。然而存在的问题是，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似乎都有一种阶级决定论的观点，即社会成员的所有特质（例如掌握知识）都是通过“成为阶级”才获得权力。这应该是在马克思划定的框架内前行难以避免的局限。

新韦伯主义的学者虽然也研究社会结构，但是他们的视角似乎更倾向于从主体出发，在他们那里，个体的财富、权力、声望是测量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指标而不是相反。韦伯的“社会封闭”的概念被帕金（Parkin）首次借用，“帕金则进一步发挥了韦伯的社会封闭概念。在帕金看来，统治阶层通过排他来维持和增强自身的特权，而那些被排挤的阶层因不能采取‘排他’策略转而采取‘内固’手段，这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促成了社会封闭现象（Parkin, 1974）。吉登斯（Giddens, 1973）也认为，社会封闭是阶层形成的基本条件。”（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2004）在他们的观点中，财富、权力、声望似乎都是社会封闭的手段，而个体的这些特质正是由于社会封闭而产生各个社会地位不同的人群。吉登斯提出“结构化理论”，试图突破结构和行动间的二元对立。“吉登斯认为，社会学应以序列在时间面和空间面上的社会实践作为它的研究对象，而非（结构以外的）行动或（在行动之上的）结构。”（谢立中，1998：516）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吉登斯对于权力的看法是与前人不同的，吉登斯认为，在逻辑上行动是前设着权力的。在这个前提下，所有的行动者都是拥有权力的。吉登斯认为，在行动层面上，权力之根本是行动者对发生在他周围的事情所能产生的转化作用。一方面，行动在逻辑上前设着行动者对他周围事物的转化能力；另一方面，行动者所前设着最基本的权力（转化能力），在社会环境里的表现，是行动者对社会上分配性资源和命令性资源的支配能力。基于这两点，没有人是完全没有权力的，一个行动者与另一个行动者之间的支配关系，其实是一种双方在权力上互相制衡和争持的情形，吉登斯称之为控制上的辩证。（同上：520）然而，权力和他所谓的结构的沟通逻辑究竟是什么，吉登斯似乎并没有明示。

米歇尔·福柯在马克思和韦伯开创的思想路线上继续前进，发展了同现代组织制度相关的权力、意识形态和话语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观念，话语的作用对他关于社会中权力和控制的思考有很重要的影响。“根据福柯的观点，由权力或权威所建立的专家话语通常只受到与此形成竞争的专家话语的反对，因此话语成为一种工具来控制人们的思维和讲话方式。知识变成了一种控制力。贯穿于福柯作品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权力与知识是同监督技术、强制力与规训相联系的方式。”（吉登斯，2003：642）因为知识和话语在权力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权力不再是单向度的统治。它是多形态的，是作为关系出现的策略，是生产性的实践（李猛，1996b）。既然“权力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视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运作”（米歇尔·福柯，2003：26），那么就有必要充分考虑权力关系实践的过程，而非仅仅关注谁获得权力。福柯正是把对权力的分析集中在微观层面，并发展出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萨义德（Edward Wadie）认为福柯思想中最重要主题就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因为知识往往被操作化为策略等，这个策略就是权力通过“知识”来实践，“社会和历史中实施主导控制的意愿是如何通过真理、纪律、合理性、功利价值和知识等语言来系统地自我掩盖、欺骗、解释和伪装的”（张兴成，2001）。虽然萨义德对福柯的思想推崇备至，尤其是对其理论中厚重的历史维度，但是他也对福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萨义德认为，福柯的权力理论来自他对禁闭系统所作的内部分析，对特定情境中的问题（如监狱、性意识）的分析是‘无与伦比’的，但福柯一旦将这种特定情景概括为权力关系的一般逻辑，将权力分析从微观世界推及社会时，方法论的突破就成了理论陷阱”（张兴成，2001）。在《规训与惩罚》的后半部分，福柯已出现对权力让步的迹象，认为任何真理、正义、价值等仅仅是权力的外衣，福柯将“权力无处不在”这一观点贯穿在几乎所有的分析领域。同时，福柯的研究是非常个人化的，虽然重视历史方法，但是视角过于微观，缺少对族群、集团的权力关系的关注。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似乎和福柯一样把知识和话语看作权力的编织者，但是布迪厄倾向于将权力过程看做是特定场域内的各个资本的博弈和策略的选择。正是符号系统支持着这种选择，“符号系统不仅仅是知识的工具，还是支配的工具（在马克思那里是意识形态，在韦伯那里是神正论）”（布迪厄，华康德，2004:13）“布迪厄借鉴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指出所有行为都是与利益相关的，包括符号的追逐（symbolic pursuits）”，“相应地，布迪厄把‘行为’说成‘策略’，以便强调人类行为的利益定向。策略是与‘物质与符号利益最大化’相联系的。作为策略的行为表达了这样的观念：个体的实践本质上与利益有关，行动者尝试从定位中获得利益。”（戴维·斯沃茨，2006：77）对符号利益的追逐也强化了文化生活的结构。人们通过被动接受具有符号象征的知识和话语而被操控，当这种操控成为“惯习”，他们主动迎合这种操控，并且要求其他人也一样。由此看来，这个“操控”的过程是没有主体的，而是文化被建构起来之后在人群中传播的效应。“场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限定了权力关系的边界，同时也隐喻了权力实践的规则和结构。“布迪厄把场域的自主性和符号权力的概念联系起来。随着文化场域逐渐从政治和经济中解脱出来，获得自主性的发展，他们获得了符号权力，即把现存的社会安排加以合法化的权力。结果，场域引诱人们赞同现存的社会安排，并在使行动者卷入场域自主性的意义上有助于这种社会安排的再生产。”（同上：147-148）亚历山大（Alexander）批评了“布迪厄对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进行的争辩”，而这个错误的批判正是为“惯习”概念奠定了基础（杰夫瑞·C·亚历山大，2003：172）。这种对布迪厄理论近乎全盘的批判似乎有不恰当之处，但是他抱怨布迪厄对于文化主义的曲解是有道理的。亚历山大认为，理性选择理论家们通过把文化理论表现为客观主义决定论的一种形式，提出只有对行动进行某种反文化的理解，才能使意志论得到维护；马克思为了给其理论开辟道路，曲解了文化传统，把文化理论描绘成彻头彻尾的唯意志理论和个人主义理论，即唯心主义理论，从而可以“把集体主义的唯物主义当作唯一切实可行的理论选择来引进了”。而布迪厄实际上是将行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理论的曲解结合起来，因此“一种既具有集体性，而最终又具有工具性的理论可以得到适当的辩护”（同上：179）。

上述经典的权力理论对权力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理论逻辑的二元划分是显而易见的。韦伯和马克思，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功能主义和常人方法学，甚至声称要打破这种对立的吉登斯、布迪厄，和被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福柯都没能逃出二元对立的陷阱，可以说二元对立已经根植与理论发展的脉络中了。

二、大学生生活社区内的权力关系

本文要研究的是在XX大学的生活社区中，作为被管理者的学生与管理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在社区中，管理者似乎就是发号施令的人，其实也不尽然，管理者常常面临的是大学生的争吵、抗议或是非暴力不合作。而面对文化优越感很强的大学生，管理者并不是没有办法，他们试图通过控制学生的行为分和入党资格来换取学生的服从。前者决定学生能否顺利毕业，而后者则决定学生能否获得一个较好的政治身份。魏昂德(Walder)的研究表明：“大学学历是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最强的预测指标，而党员身份对此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党员身份是进入行政管理行业最强的预测指标，大学学历对此也有显著的正作用”（魏昂德，2002），因此无论是大学学历还是党员身份都对大学生工作后的职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是管理者对于使大学生服从管理的尝试似乎并不成功，这说明在下列两个环节中至少有一个是值得商榷的：一是大学生是否认为大学学历和党员身份在当代是否仍然对大学生的职业发展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二是生活社区的管理者是否真的可以操控大学生的毕业或入党？这两个问题似乎不难解决，但是解决一个问题意味着将要面临下一个问题：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学生对管理者采取了近乎“绝对服从”的态度，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这部分学生和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同学有隔阂吗？三方都渴望从学校获取更多资源，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遵循着怎样的逻辑？是怎样的结构维持着这样的逻辑？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将依赖于笔者对XX大学的组织模式、社区管理员聘用制度和校规等相关文献的研究以及对大学生和社区管理者的访谈的分析。通过对前人权力理论的综述，尤其是受

到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启发,笔者希望通过“结构—关系”的模式来解释这一系列问题。“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2004:133),结构则可以看做一个跨越场域的关系的网络,它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作为一个抽象出来的解释存在的。它解释了场域之间的影响和场域内部关系(权力)实践的逻辑等等。“关系”隐喻了微观的、主体的、经验性的事实;“结构”隐喻了宏观的、客体的、理论性的解释。这样的对应并非是生硬的,它们的结合有着比尝试突破二元对立更重要的作用:更好得诠释一个事实。

第一章 经验与方法

理论和经验的相融既是实证研究者的追求,也是本文所努力尝试的目标。上文提及的“结构”和“关系”与生活世界中的情境特征对应,会构成一个嵌入行动者日常生活中的立体网络,这网络既涵盖了宏观的社会情境,也涵盖了微观的人际关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模式下,作为总体的社会事实便不再混沌,它可以被解构为“结构”与嵌入其中的“关系”的共同影响。当然,这样一个复杂的模式必须能经得起经验材料的考验。

第一节 以往的研究

在国内相关研究中,针对基层大学生社区的论文寥寥无几——张耀等(2007)通过问卷调查,对大学生生活社区内的一些指标作了频数统计,然而这样程度的描述远远不足以解释社区内学生与管理员的权力逻辑——更多的是关于基层居委会的研究,二者所处社会结构的同质性因素为本文提供了与之对话的可能。然而,大学生社区内权力各方所控制的资源与城市基层居委会又有所不同。桂勇(2007)认为,相对于农村基层的权力运作,基层居委会更多的运用非正式权力操作,即认同、信任和人情面子的交换。“农村基层的权力运用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益的相互斗争,并以一定的惩罚性手段为后盾,有时甚至是以暴力手段为后盾的;而城市基层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则要微妙得多……事实上,这种操作主要是民众与国家之间彼此进行‘模糊’表达的一种微妙机制。”在笔者看来,大学生社区中的权力机制是在“威逼利诱”和人情面子之间游离的,这二者适用的情境也是本文试图阐明的问题之一。

关于基层居委会的研究,其视角大多在于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方面,当前国内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国家在城市基层社区所展现的力量正在逐渐减弱。例如林尚立(2003)关于居委会的研究指出,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全能型政府调控模式将逐渐消失,居委会也将由政府的“派出机构”转变为一个自治性的机构。这样,在城市基层将出现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即一个基层群众自治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金桥(2007)则在其博士论文中阐述了国家不在场的情境下基层权力运作的逻辑,其重点在于行动者的策略。第二种观点强调了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区建设运动所带来的城市政权向基层社会的渗透,以及国家以各种形式对基层社区的影响。一些文献则指出近些年居民委员会的行政化趋势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家政权的向下渗透(桂勇、崔之余,2000;李友梅,2002)。例如,朱健刚(1997)关于“社区行政建设”的研究表明,街区权力正在强化,国家正借助于社区建设运动试图渗透到城市基层,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郑长忠(2005)也指出国家意志通过基层党组织向下渗透,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基层居委会直选。第三种观点认为国家对基层的控制的情形可以融合前二者的理论解释,“目前城市基层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非是断裂的,也不是嵌入式的,而是呈现一种‘粘连’状态,即国家与社会仍然有相当程度的接触,但并不是牢固地镶嵌在一起的,而是相对较为松散地粘合在一起。国家对邻里的动员与控制并非像‘嵌入’论所想象的那么强,但国家也未从邻里社会的视野中

完全消失。”(桂勇, 2007)这种“粘连”模式的内涵是, 基层社区以国家的意志为行动的目标, 然而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夹杂了很多非正式的关系网络的因素和人情面子的交换。关于这一点, 金桥(2007)在其论文中有很详细的分类和叙述。

第二节 研究框架

“社区”在社会学话语情境中有着远比空间层面的概念更丰富的内涵, 它是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共同体, 这个身份认同可以是地缘的、情感的、组织的, 甚至可以存在于虚拟网络中。因此本文所提及的“大学生社区”指的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概念, 它可以被理解为大学生生活的场域¹。通过对这个场域内的大学生和管理员之间复杂权力互动的分析, 可以解释绪论中提及的一些问题, 并且对这个复杂的权力逻辑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

本文的主要理论视角是运用本土权力理论(黄光国, 1998; 翟学伟, 2004)分析社区管理员、社区积极分子和社区内普通学生(尤其是不合作学生)的权力互动过程, 并将其置于社会结构与分层的宏大背景中²。本文有三个基本观点: 观点 1, 在当下, 大学生仍然认为大学学历和党员资格对于获得好的职业仍然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观点 2, 生活社区的管理员并不能真的影响大学生的毕业或入党; 观点 3, 制度性权力的非正式操作策略是管理员维持其支配权力的重要途径。这三个观点正对应了“结构-关系”模式的两个方面。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文属于质性研究。质性研究是指“在自然环境下, 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与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 其分析方式以归纳法为主, 研究者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 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 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观点和理论, 通过证伪法和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 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 其个人背景及其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 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必须详细加以记载和报道。”(陈向明, 1996)由于笔者在决定做此研究之前已经在该大学生社区生活了三年, 在实地体验和参与型观察等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除此之外, 笔者通过访谈法和查阅相关文献收集资料。也许笔者的学生身份会影响到“价值中立”的原则, 然而即使做此研究的出发点有所偏颇, 笔者也力求做到依据理论和经验材料, 通过逻辑上的推理得出结论。访谈的样本是这样选定的: 笔者找到熟识的管理员, 通过她的介绍访问了其他管理员和社区积极分子; 社区内的普通学生最初源于同学的介绍, 然后通过“滚雪球”的方法来扩大样本。样本共八人, 其中包括两名男生, 三名女生和三名社区管理员。通过访谈, 笔者收集到 150 分钟的录音材料, 整理成的文稿近两万五千字。这些访谈既为笔者提供了研究思路, 又为文中的一些观点提供佐证。

第二章 管理员的控制困境

根据三年多的生活经验, 笔者发现管理员常常面临的是大学生的争吵、抗议或是非暴力不合作。冲突的来源对解决路径有很大的影响, 要想揭开隐藏在事件表象中的逻辑, 必须对以上二者作深层的描述和分析。

第一节 作为田野点的 XX 大学学生社区

¹ 为了便于理解, 笔者借用了布迪厄的“场域”的概念, 但是本文的理论框架并不是基于其场域理论之上的。

² 具体指大学生未来的职业路径。

XX大学学生社区成立于1993年，调查地点校本部学生公寓现有57幢学生公寓，住宿学生两万余人。社区的“管理模式由XX大学和上海市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组成大学生村管理委员会，下设‘学生社区管理部’、‘物业管理部’、‘学生自我管理委员会’。其物业实行社会化管理，主要承担学生村的保安、（外）保洁、保绿和维修等服务。”¹管理员多为女性，在招聘时均要求是上海户口，党员优先。每幢楼有一名管理员和两名值班员，三个人每人一天轮流值班，晚上门禁后睡在值班员宿舍。学生在社区中的生活有着细致的规定和诸多奖惩措施。社区生活中的各项规定包括卫生、安全、公共秩序等方面。奖惩措施主要包括个人层面和集体层面，在个人层面，除了加减学生“行为分”，社区还制造了各种荣誉，例如“社区学生标兵”、“社区先进个人”、“社区积极分子”等等，在集体层面，也有“特色寝室”和“文明楼”等各项评比。值班人员每天早上八时开始对各寝室的内务卫生情况进行检查，并对各寝室的情况打分。

第二节 冲突的根源：空间呈现的差异

通过访谈，笔者发现管理员和学生对于生活社区空间的想象存在很大差异。校方意识形态把社区空间想象成一个集“思想教育、学业辅导、文化建设、生活服务、行为指导、安全防范”²六大功能于一体的生活区域。作为学校在基层学生社区的代理人，管理员的业绩往往通过这六大功能衍生出的一些指标来考评，往往这种考评也与物质利益挂钩。“1. 凡获文明楼称号的楼，授予文明楼铜牌，按全楼学生数奖励活动经费1.5元/人，管理员奖励50元/人，其他工作人员奖励20元/人……6. 在文明楼的基础上获得五星的楼，在文明楼的铜牌上挂相应颜色的星，按全楼学生数奖励活动经费2.5元/人，管理员奖100元/人，其他工作人员奖50元/人。”³尽管如此，根据对管理员的访谈来看，他们关注的更多的是生活服务、行为指导和安全防范这三方面。所谓“文明楼”的评比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往往成了寝室内务卫生状况的评比，因此学生和管理员的冲突相对而言更多发生在早上管理员检查宿舍内务卫生的时候，实际上，除了一些积极分子，大多数学生在其他时间很少与管理员接触。然而，对于社区内生活的学生而言，社区更多的是进行“睡觉”、“打游戏”、“看电影”“看书学习”、“聊天”等活动的空间。张耀等人的调查报告也佐证了这一情况，“大学生宿舍社区的功能主要是生活居住(88.8%)，其次是休闲娱乐(71.4%)，再次是学习(69.4%)、思想交流(64.4%)。认为大学生宿舍社区的主要功能为政治教育的比率最少，只有11.7%。这说明在大学生看来，宿舍社区的主要功能主要集中在学习、生活和娱乐方面”（张耀等，2007）。在空间的呈现（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呈现的空间（The space of representation）（Lefebvre, 1990）强烈差异之下，社区空间内实践双方的冲突也应运而生。

第三章 管理员的控制路径

在一个存在冲突的场域中，每一方都试图通过控制有限的资源来取得支配他人的权力。作为学校和社区的代理人，社区管理员掌握了学校通过制定一系列社区规章制度赋予其对“行为分”加减的权力。“社区管理部将对每位住宿学生在社区日常生活中的品行表现以及奖罚情况逐一记录在档，并按照统一的标准折算成分数，奖励分为‘+’分，处罚分为‘-’分”⁴，二者可以相互抵消。然而，“行为分”的震慑力对学生而言体现在哪里，即学生为什么要用自己的服从管理来交换行为分？从学校的规章看来，学生的“行为分”非常重要。

¹ 引自《XX大学学生社区指南》（2008年版），P3.

² 引自同上，P1.

³ 引自同上，P38-39.

⁴ 引自同上，P12.

第一节 大学生的职业路径

魏昂德 (Walder, 2002) 认为大学学历和党员资格分别是获得高级技术职位和进入行政管理行业最强的预测指标。然而人事部 (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06 年的调查数据表明¹, 六成应届毕业生面临岗位缺口。在中国, 大学学历的贬值使工作经验和各种职业资格证书逐渐成为获得高级技术职位的途径。就进入行政管理行业而言, 党员身份仍然是重要的条件, 尽管多数公务员考试并不要求考生具备党员资格, 毋庸置疑的是, 在实际操作, 也就是面试环节, 党员是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的对象, “你考公务员, 考村官什么的, 有的硬性规定你要是党员身份你才有资格报这个职位”。企业为了降低员工培训的成本, 有时更倾向于工作经验丰富的求职者, 而获得晋升的正式途径往往是获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 而非曾经有一份较高的学历; 在行政管理行业更加重视的是思想政治素质, 尽管党员数量泛滥, 然而因为没有可替代的“资格证书”, 党员身份在公务员录用的时候成为非常重要的条件, 基于这个条件再来考量考生的能力、关系网络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 在行政管理行业, 特别是到了高级别的岗位, 学历有时会成为晋升的门槛。总之, 在人才市场上大学学历的作用并不像 1996 年以前那样显著, 虽然有可以替代的资格证书, 但求职者为此付出的辛苦要比获得大学学历多很多。党员身份的作用也有所减弱, 然而它作为进入行政管理行业门槛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第二节 “行为分” 在职业路径中扮演的角色

如果严格遵照《学生社区指南》, “行为分” 非常重要, 它同时影响了学生的毕业与入党。XX 大学采用的是“学分制”, 简而言之, 只要学分修满, 即使只上了 3 年也可以申请提前毕业; 反之, 学分没有修满就要延长学籍, 直至修满方可拿到学历。通过阅读《指南》可以发现, 学生在社区的表现占了 0.5 个学分, “《思想品德与法律基础》(实践部分) 是必修课程, 占一个学分, 在社区的日常行为表现为 0.5 个学分”², 这 0.5 个学分的裁量权完全在社区管理员手中。“社区办公室对于每名学生的奖罚情况将定期反馈给各学院及学工办, 记录在档, 以供学生查询。作为学院审批入党、评审奖学金、评选优秀班团干部和优秀毕业生以及品德评定的依据之一。(学生社区行为档案卡贯穿大学生生活 4 年)”, “在一学期中社区行为等级为 C 等 (含 C 等) 以下者, 如果是入党积极分子, 则当年不能发展入党; 如是预备党员, 建议延长预备期或取消预备期”³。可以看到, 除了入党之外, “行为分” 的奖罚对于其他各项荣誉的评审都会有影响, 而大学阶段获得的各种荣誉无疑是大学生求职简历中最重要的砝码之一。管理员除了可以为即将入党的学生写评审意见之外, 还有推荐优秀社区学生参加社区党校的资格, “对于递交入党申请书半年以上、在社区表现出色的入党积极分子, 社区管理员提名推荐”⁴ 也就是说, 从社区规章制度方面讲, 社区管理员对学生行为分的奖惩决定可以影响到学生的毕业和入党的进度。这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以后的职业生涯, 这样看来, 这两方面的制度似乎就可以使管理员有效地控制学生的行为。

第三节 管理员的控制困境: “无效” 的正式制度

在实际操作中, 社区制定的各项规章并没有使管理员对学生的控制像理论上那样有效。通过访谈发现, 管理员常常遇到的麻烦是学生对于“行为分” 的惩罚并不在乎。根据《指南》的规定, 一学期累计罚分 60 分以上或学年累计罚分 100 分以上, 会有相应的处罚措施, 然而这些处罚措施实际上无关痛痒, 况且, 根据笔者的经验和观察, 没有极其恶劣的行为 (如打架斗殴、聚众赌博等), 罚分一般不会超过指定的分数。所

¹ 参看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和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 2006 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大学生求职与就业状况的调查报告》。

² 引自《XX 大学学生社区指南》(2008 年版), P23.

³ 引自同上, P26.

⁴ 引自同上, P66.

以很多同学无所谓“行为分”的惩罚。“我们有个同学嘛，就是扣了蛮多行为分的，开始还蛮紧张的，扣那么多行为分怎么办。但是后来发现每个月都有一定额的行为分可以让你扣，就是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有惩罚，那就无所谓了，我再扣也不会扣到哪里去。所以无所谓的，这个额度还是蛮大的。”关于社区日常行为表现的0.5个学分，笔者仔细地研究了评定标准，“评定。成绩分优、合格、不合格三等。优的比例控制在15%以内，其余等级不作比例限定”¹，这样看来，管理员完全可以让所有的学生都“合格”，社区管理部难以承担仅仅因为社区表现不佳影响学生毕业的舆论压力，这条规定是正式制度给自己开的后门。管理员多数情况下不会给学生写不好的评定来影响学生的入党进度，但是常常以此为要挟来支配学生，学生由于有求于人也会很配合的服从管理员的要求。但是过了写评定的那几天，学生便又一如从前了。因此，在笔者看来这种短暂的要挟不能称为“有效”。

第四节 解决困境的路径

在冲突不可避免以及正式制度无效的双重困境下，社区管理员往往采用“软硬兼施”（孙立平、郭于华，2002）的应对策略。管理员常常是和蔼的，许多时候她在社区中扮演了夹缝中生存的弱者的角色。“明天社区组织检查，你们就帮帮阿姨的忙，把卫生搞搞好”，“阿姨也不想打扰你们，阿姨很辛苦的，整幢楼都是阿姨一个人打扫，社区来检查，没办法呀”，通过这种方式，管理员把冲突和矛盾抛到社区，学生会说“社区有毛病，三天两头来检查”，管理员常常这样买学生一个人情，并以以后的日常内务检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还这个“人情”。“我感觉没什么苛刻的要求。一定要怎么样。大检查，领导检查可能要求高一点，平常没什么大的要求。被子叠一下嘛，地扫干净啊，其他事情就算了。我感觉如果要求太死板了，学生反而反感。对吧，你也从大一过来，你也知道的。”这样一来，管理员仍然可以和学生保持表面良好的关系，在基层社区的工作就更容易展开。学生大多吃软不吃硬，“阿姨说得这么客气，我们也不好跟她撕破脸皮”尽管每天的内务检查和定期的社区检查常常扰乱学生的生活，学生往往“给她个面子”。管理员偶尔也采取强硬措施，“我大一的时候就被扣过，大一的时候很傻的，当时我们就通宵唱歌回来，后来被阿姨发现了，她开始就扣了，很严肃的批评我，后来我就哭了，然后她就安慰我说这是第一次，下不为例，就帮我把行为分擦掉了，后来就没有扣。”通常情况下，管理员会通过借助科层力量的方法来使自己的强硬措施变得有效。学生寝室的一般是按照院系来安排，这样既使邻近宿舍的同学容易相处，又能使社区在控制学生时能够借院系的科层力量对学生施加压力。例如“社区办公室负责全社区学生的奖惩积分汇总和审核。每学期汇总一次上网公布，反馈给学工办和各学院。作为学院对自己学生在社区行为表现的了解和有的放矢的开展工作，也作为学工办对学院工作考核的依据之一。”² 笔者与管理员F的对话可以证明这一点已经被实际操作了。

W: 您早上查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睡懒觉的同学或者其他不符合规定的行为？您是如何处理的？

F: 我是这样的，先教育为主，不会扣他分，像睡觉的同学，我说，到现在还没起来，好起床了吧！哦，我就起来了。那就没问题，毕竟同学晚上学习比较晚。如果不理我，叫几次也不起来，还在睡觉，我就要扣分，报学院。我们每次督导分都要报学院的。

W: 像这种学院会怎么处理？

F: 学院会处理，会跟我们社区沟通。学风督导里面都有的，睡懒觉啊都有这一块。像土木学院是这样的，如果查到社区扣分的，他们马上要通报批评。严重的叫父母来。

W: 现在学院对这个社区很重视的对吧？

F: 很重视。我们社区如果什么事情报告学院，学院马上会来。我们今天和学院配

¹ 引自同上，P23.

² 引自同上，P13.

合很好。

W: 我们读大一大二好像还没有这样重要。

F: 现在很重要了, 想我们这次评文明楼建设, 我们两个学院都很好, 学院都马上过来, 马上配合我们。

也就是说, 学生在社区的行为表现成为考评学院团委的指标之一, 学生在学院中的奖学金及其他各项荣誉的评选都与其在社区的行为表现相关。“比如学院里面的奖学金, 肯定优先考虑。比如通信学院里要评奖学金, 评优, 学院辅导员、领导会把名单给我, 我们社区一块跟学院结合起来, 可以带动整个学生的积极性。”由于XX大学招聘社区管理员时要求党员优先, 在社区中, 多数管理员都有党员身份。一般情况下, 每幢楼的管理员都会成立党小组, 利用党组织的科层体系对全楼的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控制和管理, 楼里如果是党员, 就把党员组织起来。“像我们5号楼有7名党员, 我马上把他们组织起来, 组成党员小组, 从党小组里成立楼管会。再找他们的同学, 把入党积极分子组织起来, 在入党前要他们学习。党员的核心, 把整个楼的活动带动起来, 有的党的组织带, 我想别的工作都好做。”“入党积极分子必须参加楼内党员工作室组织的学习, 和完成分配的工作任务”, “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在社区的表现, 接受社区管理员和同学的评议。”¹学生党员因为已经获得了理想的政治身份, 不需要管理员的好评语, 因此有时会不服从管理员的分配。这种情况下管理员常采用“戴高帽”的策略来引导学生积极配合。因此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中也产生了很多在社区的积极分子。

不得不提的是, 社区的积极分子在管理员控制学生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社区的积极分子主要是楼管会成员, 每幢楼设有楼长, 各部长(如学习部长, 生活部长等)和层长。社区楼管会的成员与普通学生地位平等, 没有支配或从属关系。每当社区接到任务, 或是需要动员学生参加活动时, 社区积极分子往往拉上自己的同学或熟人一同前去。如果是一同生活学习的同学或朋友, 被拉的同学一般不会拒绝。

W: 那你一般怎么动员?

B: 我找关系好的人拉去呗, 因为好像很多人都比较懒散, 都不喜欢参加这些活动啊?

W: 那你通过什么方式让她们去参加的呢?

B: 因为我人比较好, 她们都会照顾一下, 因为就是说“给个面子嘛”, 然后大家就去了。

W: 她们经常帮你去凑人数参加活动, 你一般怎么还人家这个人情啊?

B: 一般她们要借书啊, 我会帮她们借书, 因为我比她们高一级嘛, 给她们学习上的指导, 而且我平常也蛮关心她们。”

在如上女生B的个案中, 该积极分子人缘较好, 通过向同学借阅学习资料和提供一些咨询来还这个“人情”。如果积极分子人际关系不佳, 往往没有学生买他面子, 他就很难完成管理员交付的任务, 那么管理员对于整幢楼的动员能力也相应下降。马克·格兰诺维特(马克·格兰诺维特, 2007: 38)在其论文“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中对类似现象作了理论解释。社区积极分子就这样通过与普通同学的人情和面子交换来完成管理员交付的任务, 作为回报, 社区管理员往往给予积极分子各种社区的荣誉, 如“社区学生先进个人”、“社区学生标兵”等等, 多数学生认为这样的荣誉可以为自己的求职简历增加分量。

¹ 引自同上, P67-68.

第四章 结论

通过本项研究可以发现,就获得一份好的职业而言,在当下,大学学历的作用并不像1996年以前那样显著,虽然有可以替代的资格证书,但对于已经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说,放弃大学学历去追逐资格证书的机会成本太大。对于在读大学生来说,拿到学历是大学期间的主要目标之一。党员身份的作用也有所减弱,然而它作为进入行政管理行业门槛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而大学生生活社区的管理员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去影响一个学生的毕业进度,对于入党,管理员也仅仅能做到短时间的“要挟”,因此社区管理员并不能真正操控大学生的毕业和入党的进度。学生之所以不配合社区管理员的支配,是由于基于对社区空间想象的差异而造成的管理员对学生生活的干扰。由于这种“不配合”,管理员常常以“行为分”作为强制的工具,尽管“扣行为分扣到退学”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就如福柯所说的“圆形监狱”(福柯,2003)一样,管理员可以通过它来管理新入住的学生。对于了解社区“地方性知识”的高年级的学生,社区管理员不得不采用一些非正式的策略,例如,通报学院和辅导员、卖个人情给学生、以各类荣誉作为学生配合其工作的交换、通过党组织和社区积极分子来动员学生等等,社区积极分子的关系网络也直接影响到管理员对全楼学生的动员能力。

从韦伯对权力作定义开始,学者们研究的焦点总是在于这种排除反抗而贯彻自己意志力的控制能力是如何产生和发挥作用的。从韦伯对科层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于生产资料的关注,到后来福柯的知识权力和布迪厄所强调的文化资本和场域中实践者的策略,他们对于权力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这些理论和具体的生活情境相关联的时候,总是会发现这样或那样的不吻合的情况。一个作为模型的理论只适合各种“理想类型”,如果填装了多元的生活情境,一定会有所遗漏。针对居委会的一系列基层权力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一派认为国家权力尤强,忽视社区的自治力量,另一派则反之,这样就自然地走向相对主义。因此,笔者尝试通过这样一个实证研究来建构一个动态的理论模式。“结构”指的是权力实践各方所处的外部环境,如社会背景,组织等,“关系”则具体指权力实践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个关系是复杂的,也是宽容的,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它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例如在本文中,城市的就业形势和校方的正式制度是一个笼罩在学生和社区管理员日常生活中的结构,管理员与学生在社区权力逻辑中使用的非正式的权力操作策略(尤其是人情面子的交换)则体现了结构笼罩下的关系。这关系是建立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的,它与结构并非是割裂的,相反,它们息息相关,组成了一个立体网络,共同影响了学生生活社区的权力实践。

参考文献

Lefebvre, Henri.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ress.

布迪厄,皮埃尔、华康德. 2004. 实践与反思[M]. 李猛,李康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陈向明. 1996. 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J]. 中国社会科学(6).

福柯,米歇尔. 2003. 规训与惩罚[M]. 刘兆成、杨远婴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格兰诺维特,马克. 2007. 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 罗家德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桂勇. 2007. 邻里政治: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J]. 社会(6).

桂勇、崔之余. 2000. 行政化进程中的城市居委会体制变迁[J]. 华中理工大学学报(3).

- 黄光国. 1998. 人情与面子: 中国人的权力游戏[G]//黄光国, 编. 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 吉登斯, 安东尼. 2003. 社会学(第四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贾春增. 2000. 外国社会学史[M]. 修订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金桥. 2007. 基层权力运作的逻辑[D]. 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 柯林斯, 兰德尔、马科夫斯基, 迈克尔. 2006. 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评述[M]. 李霞译. 北京: 中华书局.
- 孔寒冰、项佐涛. 2006. 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种“异端”现象——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剖析[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4).
- 李猛. 1996. 从帕森斯时代到后帕森斯时代的西方社会学[J].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
- . 1996. 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技术[D]. 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 李友梅. 2002. 基层社区组织的实际生活方式——对上海康健社区实地调查的初步认识[J]. 社会学研究(4).
- 林尚立. 2003. 社区民主与治理: 案例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刘力永. 2007. 尼科斯·普兰查斯: 一个非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J]. 国外理论动态(4).
- 伦斯基. 1988. 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M]. 关信平等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米尔斯. 2004. 权力精英[M]. 王崑, 许荣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斯沃茨, 戴维. 2006. 文化与权力[M]. 陶东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孙立平、郭于华. 2000. “软硬兼施”: 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J]. 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
- 陶文昭. 1997. 知识分子“新阶级论”评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1).
- 涂尔干. 2000. 社会分工论[M]. 渠东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魏昂德、李博柏、特雷曼. 2002. 中国城市精英的二元职业路径: 1949—1996[J]. 魏亚萍译. 国外社会学(2).
- 韦伯. 2004. 支配社会学(韦伯作品集III)[M]. 康乐、简惠美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谢立中. 1998. 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 亚历山大, 杰夫瑞. 2003. 世纪末社会理论[M]. 张旅平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翟学伟. 2004.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J]. 社会学研究(5).
- 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 2004.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阶层构成[J]. 社会学研究(6).
- 张兴成. 2001. 福柯与萨义德: 从知识-权力到异文化表述[J]. 天津社会科学(6).
- 张耀、沈岳、毕延玲. 2007. 大学生宿舍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调查研究——关于华中科技大学宿舍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现状问卷调查的分析[J]. 东南传播(5).
- 郑长忠. 2005. 在民主与控制之间: 基层党组织主导下的居委会“直选”[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
- 朱健刚. 1997. 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 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J]. 战略与管理(4).

文章来源: 作者投稿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